

# 语言变异的本土化

——以包头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为例

刘英，徐大明

## **The Localization of language variation: with the example of Nasal Variation in Kundulun, Baotou**

*Liu Ying, Xu Da-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asal vari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Kundulun, Baotou. By analyzing the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its constraints in this community, we explore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localization. Our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nasal variation in this district has been localized gradually. Reducing influence of original dialects of immigrants' hometown helps developing the specific regional dialect in this district.

**Key Words:** language variation, nasal, localization, the district of Kundulun, Baotou

[基金项目] 本项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03BYY008]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英（1975-），女，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副编审，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徐大明，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通信地址：江苏南京四牌楼2号 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邮编：210096

Email: [yliu\\_wjw@yahoo.com.cn](mailto:yliu_wjw@yahoo.com.cn)

电话：13851661459

# 语言变异的本土化<sup>①</sup>

——以包头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为例

刘 英, 徐大明

**提要** 本文应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方法, 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作定量分析, 观察分析了这一工业移民城市共时层面上的语音变异及其制约机制, 从而窥探到其本土化的渐进过程: 鼻韵尾在昆区的变异已经逐步出现本土化倾向, 祖籍因素制约力的减弱表明移民的家乡方言特征将逐步淡去, 这将有助于形成昆区本土的方言特征。

**关键词** 语言变异 鼻韵尾 本土化 包头昆都仑区

20 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兴起和发展, 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工业移民城市, 其复杂的语言状态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sup>[1-6]</sup>。那么, 时至今日, 这些城市的语言发展究竟如何? 其居民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状况又是怎样? 本文选择包头昆都仑区, 以语音变异为例, 采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对工业移民社区语言变异的方向进行探索。包头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 它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工业化建设时期, 随着包头钢铁公司等大型国营企业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 是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 包头是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 土著居民数量很少, 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支援包钢的建设者和随迁人员。昆都仑区是包头的中心城区, 市政府所在地。

## 一、引言

### 1.1 研究目的

汉语鼻韵尾变异的常见表现形式包括: (1) 完全没有弱化的形式: 即原式, 非鼻化的元音后面连接着鼻辅音, 如“汉[hàn]”; (2) 鼻化的形式: 元音鼻化, 鼻韵尾也没有脱落, 如[hän]; (3) 脱落的形式: 鼻韵尾脱落, 以鼻化的元音结尾, 如[hä]; (4) 脱落加鼻化: 鼻韵尾完全脱落, 元音也未鼻化, 如[ha]。(5) 儿化的形式: 元音卷舌、儿化, 鼻韵尾一般脱落, 如[har]或[här]。1987 年, 徐大明第一次运用社会语言学变异方法对昆都仑区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元音鼻化”和“鼻韵尾脱落”两个变项——进行了研究, 探索了制约鼻韵尾变异的语言内部和社会外部因素<sup>②</sup>。研究发现昆区北方话鼻韵尾的变异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原居住地、社会网络、语体、职业和家庭社会地位等 5 个外部因素对鼻韵尾的变异起到制约作用(表 1)。其中, “原居住地”成为制约鼻化的最强因素, 鼻化变异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移民的方言背景的角度来解释, 这说明了包头昆都仑的新城市和移民城市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 没有发现“原居住地”对鼻韵尾脱落的制约作用, 据此推测, 鼻韵尾脱落变异可能不是不同方言背景的产物, 而是整个北方话中的一个进行中的变化, 也可能只是昆都仑言语社区的一项新发展<sup>[7]</sup>。

表 1 1987 年调查中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比较

	职业	原居住地	社会网络	语体	家庭社会地位
元音鼻化	.102	.526	.257	-	.319
鼻尾脱落	.073	-	-	.243	.600

十多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 昆区的语言状况是否同样发生了变化?

<sup>①</sup>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3BYY008]成果之一

<sup>②</sup> 本文关于 1987 年调查的所有数据都来自徐大明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Mandarin Nasal Variation” (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社会语言学, 1992)。

第一代移民各自的方言背景是否仍然是制约语言变异的**最强因素**，还是在渐渐摆脱这一束缚，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 1.2 研究方法

2003、2004 年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再次对昆区进行了调查：通过抽样调查确定采访对象，采用录音访谈法获取了 87 人的语料样本，通过语料转写，获得 11365 鼻韵尾词次。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sup>[7-8]</sup>，使用 Goldvarb 软件，对这一万多词次的鼻韵尾变异情况及其制约机制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的假设是，包头出生的讲话人代表着昆都仑言语社区本土化的发展方向，而非包头出生的移民较多受到各自方言背景的影响。可以预见，两组样本在社会分布上肯定会有所差异，倘若整体样本结果和包头组结果相近，那么它的发展应该是朝着本土化方向，从而逐步消除移民方言的影响，形成自己的言语特征。吴翠芹<sup>[9]67</sup>已经进行过这种分组尝试，她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总体样本讲话人及包头人、非包头人的鼻韵尾变异的语言因素基本保持一致，但社会因素却存在一些差异。为此，我们把语料分为整体样本、包头（出生）组、非包头（出生）组三组样本，从年龄、性别、出生地、教育、职业、祖籍、社会网络和语体等社会外部因素的角度进行探讨分析。下文第二部分是整体样本的统计结果，及其与 1987 年调查的比较分析；第三部分是包头组和非包头组统计结果的对比分析。

## 二、整体样本的统计结果

通过 Goldvarb 的统计发现，昆区鼻韵尾的变异自 1987 年以来，已经呈现出更为有序的状态，鼻韵尾变异的两个变项都和更多的社会因素建立了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元音鼻化，在出生地上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别，非包头出生的说话人更有利于鼻化（.631），而包头出生的则相对不利（.401）。鼻韵尾的脱落则没有出现这种差异。表 2、表 3 分别列出了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的变项规则分析法的统计结果。下面分别对两个变项的社会分布进行讨论。

### 2.1 元音鼻化

表 2 显示，8 项社会因素全部成为元音鼻化的有效制约因素，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最大，祖籍次之，年龄（对应表中“代别”一栏）的作用力也很强，仅次于祖籍。与 1987 年相比较，社会网络已经取代祖籍成为**最强的制约因素**，而“原居住地”一枝独秀的制约作用也已经大大改变，元音的鼻化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再只是移民方言的产物。8 个因素中年龄、出生地、教育程度、性别是新产生的制约因素，祖籍、语体、职业和社会网络 4 个因素则是与 1987 年基本一致的，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较之 1987 年，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出生地在时隔 16 年之后，都成为有效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年龄的制约作用十分强烈，元音的鼻化随着年龄的变轻而逐渐加重，自第一代至第三代人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在逐渐增强，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规律性差异。教育程度和性别的作用力则较小。1987 年调查时，教育未显示出有效制约力，研究者的解释是：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比工农阶层具有更高的优势，因此他们也不用费心在语言上比其他人更标新立异<sup>[10]</sup>。而 16 年之后再调查则发现教育程度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在包头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陆城市和新兴的工业城市，16 年的时间还太短，因而这一因素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还较为微弱。性别上，男性成为元音鼻化的推动力，而女性不利于元音的鼻化。虽然这一因素的变异范围较小，仅为 .087，但相较于 16 年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从出生地来看，非包头出生的人更有利于鼻化，包头出生的不利于鼻化，说明昆区元音鼻化的特征最初应该是来自第一代移民的出生地方言，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业区，居民语言现在仍然受到各自出生地方言的影响，但结合年龄

的影响看来,元音的鼻化正逐渐被下一代所接受,很有可能成为该言语社区的本土言语特征。

代别 <sup>②</sup>	出生地	教育程度	职业		
第三代 .672	非包头 .631	中学 .531	干部 .545		
第二代 .537	包头 .401	小学 .481	学生 .510		
第一代 .345	范围 .230	大学 .463	商业 .449		
范围 .327		范围 .068	工人 .432		
			范围 .113		
性别	语体	社会网络			
男 .542	会话 .543	q .668	L .481	J .264	
女 .455	朗读 .333	Y .632	Q .441	范围 .404	
范围 .087	范围 .210	A .505	B .432		
		G .503	T .409		
祖籍					
东北 .652	山东 .455	其它 .294			
内蒙 .554	河北 .381	范围 .358			
陕西 .548	不详 .298				

职业、社会网络、祖籍、语体等 4 个因素虽然和 16 年前一样仍然起着制约作用,但它们的作用力发生了变化。

从职业来看,干部的鼻化率最高,其次是学生,而工人和从事商业工作(在我们的调查中主要是出租司机和其他个体户)的说话人都不利于鼻韵尾元音鼻化。从社会分层来看,除去学生以外(学生的社会分层难以确定,暂不作分析),三种职业的社会阶层高低依次为:干部—商业工作者—工人<sup>③</sup>,社会阶层越高,元音鼻化率越高,越疏离于标准语。可见,元音鼻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层化特征,对社会阶层起到一定的指示作用,可以作为一个指示项来看待,指示项具有检索意义,根据它可以知道说话人属于哪个阶层,文化水平如何,从事何种职业等等<sup>[11]101</sup>。

一般来说,语言的变化可以区分为两种<sup>[12]64</sup>:“自觉的(conscious)变化”,“是由‘来自上面的压力(pressure from above)’引发的”,如拉波夫纽约市(r)变项的社会分层;“不自觉的(unconscious)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下面的压力(pressure from below)’”,如马萨的葡萄园双元音[au][ai]的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似乎表明,昆区正在发生的元音鼻化是一种“自觉的变化”。

1987 年的调查中干部与工人对元音鼻化的制约作用和本文一致:干部有利,工人不利。从变异范围来看,当时是.083,本文则是.106,职业变项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有了提高,说明 16 年之后,昆区的社会分层更为明显了。学生的鼻化率较高,也和前面年龄越小,越有利于元音鼻化的代际发展趋势相吻合。

由于昆区是一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区,所以祖籍表示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影响。但比较 1987

<sup>①</sup>表中数据为 goldvarb 软件统计出的作用值,即在特定条件下鼻韵尾变异(鼻化或脱落)的概率,反映出某一因素对鼻韵尾变异的制约作用,大于 0.5 为有利因素,反之则不利;变异范围越大,表示作用力越强。

<sup>②</sup> 第一代: >50 岁,第二代: 21-50 岁,第三代: <20 岁。

<sup>③</sup> 依据 2002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阶层研究报告,从事商业工作者的社会阶层是高于产业工人的。

年调查和本次研究的变异范围，可以看出，祖籍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下降了很多（.526 → .358），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徐通锵（1989）所指出的：“语言的变异主要是一种自组织的过程，代代相传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途径”<sup>[13]</sup>。倘若文莱奇等人所说“至今所收集到的全部经验证据表明，儿童并不保存他们父母亲的方言特点，而是保存少年期属于同样地位的人群的方言特点”（转引自徐通锵 1989）属实，那么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发展，昆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所受到祖籍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这将有助于昆区形成自己的语言特点。

社会网络也是元音鼻化的重要作用因素，不同社会网络鼻化概率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元音的鼻化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网络特征。这与 1987 年的调查结果一致。本文的社会网络除了一个由联系人张某及其家人所构成的家庭网络之外，主要是按照说话人的居住区域来划分的，居住在相同街区（小区）的人被划分为同一社会网络，如鞍山道××小区；还有一些在公园、广场、街头等地随机抽取的调查人被视为同一网络，如八一公园等；另外几个来自机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划分为一个网络。从交际密度来看，这些社会网络的交际密度都不高，较为松散。不过，虽然工人住平房、干部住楼房的居住格局在包头已基本消失，但仍有一些是依单位而居，同一小区的人往往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此同一小区居民的人口结构有较大的一致性，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也较为紧密，他们互相串门，一起在楼下聊天、休闲，对彼此间的背景通常都有大概的了解。因此这样的街区网络密度较之 1987 年以家庭为主的社会网络要显得松散，但同一网络各成员之间也具有一定的交际密度，共同遵守一定的交际规范，由此形成一些共有的语言特征，从而与别的网络区别开来。

表中数据显示，本文的社会网络虽然与 1987 年的社会网络是根据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划分的，但在元音的鼻化特征上都同样表现出网络差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无论以怎样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网络，昆区北方话鼻韵尾的变异都将出现网络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量的变异范围（.404）比 1987 年（.257）有了较大的提高。根据米尔洛伊的理论，“较为封闭的网络产生较少的变异，比较开放的网络带来较宽的变异域”（转引自徐大明 2001：396）。由此看来，昆区作为一个言语社区，较之 1987 年时具有更为开放的网络。

语体方面，会话语体的鼻化率较高，朗读体则鼻化率较低。这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越是正式的场合，人们的语言更趋于标准化。可以看出，元音鼻化不仅在职业上显示出层次化特征，而且也表现出语体风格，可见，元音鼻化不仅是一个指示项，也是一个标记项。标记项除了指示项所具有的检索意义外，还同时反映出说话风格，拉波夫调查的（r）变项就是一种标记项，不仅反映出说话人的社会分层，而且反映其说话风格，即语体<sup>[11]101</sup>。但在 1987 年的调查中，元音鼻化没有显示出语体风格的差异，它只具有职业的区别，是一个指示项，而非标记项。

## 2.2 鼻尾脱落

表 3 显示，有 6 项社会因素成为鼻尾脱落的制约条件，性别和出生地这两项因素未对鼻尾脱落产生制约作用。

可以看出，昆区居民的鼻尾脱落也显示出代际差异，其趋势则与鼻化相反：第一代脱落率最高，其次是第二代，第三代鼻韵尾的脱落率最低。可见，第一代移民对鼻尾脱落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则越来越不利于脱落。

表 3 社会因素对鼻尾脱落的作用力								
<b>代别</b>		<b>职业</b>		<b>语体</b>		<b>教育程度</b>		
第一代 .594		干部 .556		会话 .533		中学 .570		
第二代 .484		学生 .473		朗读 .372		小学 .515		
第三代 .378		工人 .443		<b>范围</b> .161		大学 .365		
<b>范围</b> .216		商业 .418				<b>范围</b> .205		
		<b>范围</b> .138						
<b>祖籍</b>			<b>社会网络</b>					
陕西 .715	其它 .449	河北 .269	Y .671	Q .502	L .329			
内蒙 .508	东北 .435		G .599	A .500	J .311			
不详 .459	山东 .412	<b>范围</b> .446	T .556	q .500	<b>范围</b> .360			
			B .555					

鼻尾脱落的语体分布和鼻化一致：会话语体有利于鼻尾脱落，朗读语体则不利。也就是说，越是正式场合，脱落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1987年的调查也发现：说话人在正式场合中的脱落率要小于非正式场合。

中学和小学教育程度都成为鼻尾脱落的有利因素，大学则是鼻尾脱落的不利因素。1987年调查时，教育程度没有成为制约鼻尾脱落的有效因素，研究者（徐大明1992）认为这是社会地位造成的：大学教授的地位并不比工农阶层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并且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更为重要，方言更具优势<sup>[10]</sup>。而到今天，职业分层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因此成为许多人进入到职业结构，并获得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普通话已经是权势变体，我们在调查时，绝大多数说话人都认同普通话，觉得普通话好听，并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对语言的影响必然逐步显露出来。

同样，祖籍对鼻韵尾的脱落也起到制约作用，而且其作用力最强，变异范围最大。这与1987年的结果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当时的调查没有发现祖籍对脱落的制约作用。

社会网络也是制约鼻尾脱落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网络鼻尾脱落的概率各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网络特征。其作用力仅次于祖籍。1987年的调查没有发现社会网络对脱落的作用力，家庭的制约作用却十分强大。但是根据徐大明<sup>[10]133</sup>的分析，社会网络是由家庭组成的，网络因素是嵌入在家庭因素中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庭的作用力也反映出社会网络对鼻尾脱落的制约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本研究的结果和1987年是一致的。

表中结果也显示，鼻尾脱落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是鼻韵尾变异的一个指示项。职业中只有工人是脱落的不利条件，学生、干部和商业工作者都有利于鼻尾脱落。结合前文可知，工人既是元音鼻化的不利条件（.432），又是鼻尾脱落的不利因素（.426）；而干部则正好相反，对元音鼻化（.545）和鼻尾脱落都起到促进作用（.517）。由此可见，昆区工人的鼻韵尾更为稳定，变异较小，反之，干部却成为鼻韵尾变异的领导力量。在1987年的调查中也是如此：干部比工人更有利于鼻韵尾的脱落。

最后，出生地的差别未能有效地对鼻尾脱落产生制约作用。而性别的未选中则说明在昆都仑区这样一个年轻的移民社区，其居民的语言选择并未完全稳定，性别的差异没有在所有语言变异中都表现出来。

### 2.3 小结

总的来看，分别有8项和6项社会因素均对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起到制约作用，鼻化和脱落都受到了祖籍以外更多的社会因素的共同制约，表4比较了鼻化和鼻尾脱落各制约因

素的作用力大小。

	代别	性别	教育程度	职业	出生地	祖籍	社会网络	语体
鼻化	.327	.087	.068	.113	.230	.358	.404	.210
鼻尾脱落	.216	-	.205	.138	-	.446	.360	.161

可以看出：（1）祖籍和社会网络对两个变项的制约能力都大于其它因素，仍然体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但与 1987 年比较可知，祖籍的制约力已经有所下降，并且年龄的因素已经明显增强，同时还有其他多种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鼻韵尾的变异，说明昆区居民的语言特征已经不再单一地是移民背景的产物；（2）社会网络依然具有很强的制约力，而“职业”和“教育”因素的作用力虽然较之 1987 年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但还是远远低于社会网络，说明关系网络在昆区居民生活仍旧起到重要作用，垂直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3）年龄因素对两个变项的解释力较强，这一结果很重要，它显示出代际差异，证实了 1987 年调查时鼻韵尾变异初步显现的“进行中的变化”的趋势。语体对两个变项都产生作用则说明鼻化和鼻尾脱落都是“标记项”。

进一步分析，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元音鼻化产生制约作用是本次研究得出的新结果，1987 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三者并没有被选为制约因素。结合昆区的发展历史可知，它是依托包钢而建成的，其成员基本完全是各地移民，本土居民很少，可以说是一个“无本地方言社区”。1987 年调查时，昆区成立时间较短，祖籍、家庭等因素对于当时居民语言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往往掩盖了其它因素的制约作用。当时的昆都仑主要是以第一代移民为主，即使有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语言受到父母、家庭的影响也要远远大于其它因素，“一个家庭如果刚搬到某个社区，那么这个家庭的孩子语言变异形式更多地是和家庭一致。”<sup>[14]209</sup>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祖籍、家庭的因素逐渐变弱，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异质性必然渐渐显现出来，从而在影响语言变异的诸因素中占得一席之地。

### 三、分组统计结果

#### 3.1 元音鼻化

由表 5、表 6 可以看出，包头组样本受到 6 组因素的制约，非包头组的制约因素基本相同，但没有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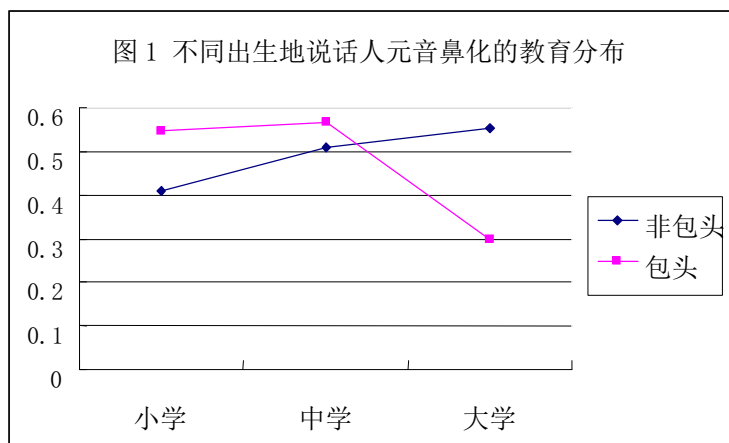
首先在语体上，两组样本的语体分布都和整体样本保持一致，会话体有利于鼻化，朗读体则不利于鼻化。

其次，两组样本都出现了性别差异，但在具体的作用力正好相反：非包头组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利于鼻化；而包头组中，男性比女性有利于鼻化，这一结果正好与整体样本完全吻合。从变异范围看，包头本地出生的说话人的性别差异已经有所增强。据此推测，随着本地出生人员的增多，老一代移民人口的逐渐减少，男性可能取代女性成为鼻化的领头人。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男性领头人则可能使鼻化带上“男子气概”的标志，从而获得一种“潜在声望”，当然这需要我们今后的跟踪研究加以证明。

表 5 包头组元音鼻化的社会作用力							
<b>教育程度</b>		<b>性别</b>		<b>职业</b>		<b>语体</b>	
大学 .299		男 .587		学生 .578		会话 .537	
中学 .567		女 .443		商业 .506		朗读 .408	
小学 .545		<b>范围</b> .144		工人 .497		<b>范围</b> .129	
<b>范围</b> .268				干部 .439			
				<b>范围</b> .139			
<b>祖籍</b>			<b>社会网络</b>				
陕西 .722	内蒙 .446	河北 .371	q .600	Y .506	T .434		
东北 .501	其它 .429	<b>范围</b> .351	G .571	A .440	Q .434		
山东 .531			B .558	J .437	<b>范围</b> .166		
			L .521				

表 6 非包头组元音鼻化的社会作用力					
<b>教育程度</b>			<b>性别</b>		<b>语体</b>
大学 .552	小学 .409		男 .459		会话 .509
中学 .510	<b>范围</b> .143		女 .581		朗读 .393
			<b>范围</b> .122		<b>范围</b> .116
<b>祖籍</b>			<b>社会网络</b>		
内蒙 .685	河北 .370	其它 .266	T .765	Y .505	B .424
陕西 .514	山东 .361	<b>范围</b> .419	q .600	A .487	L .392
东北 .498			Q .594	J .452	<b>范围</b> .373
			G .518		

从教育程度来看，两组样本几乎体现出截然相反的分布，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非包头出生的说话人鼻化的趋势完全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但变化不是很明显，三种教育程度之间差别不是很大；而包头出生的说话人则基本呈现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趋势，大学程度十分不利于鼻化，中小学程度对鼻化的作用力相当，都是鼻化的有利因素，整体样本的结果也表明大学程度不利于鼻化（.463），中学则最有利（.531）。同时，结合职业因素来看，不同职业的差别并没有成为非包头组成员鼻化的有效制约因素，却在包头组样本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撇开学生不谈，包头组鼻化的职业分布大致呈现出随着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递减的趋向，干部的鼻化率最低，商业工作者最高。这一结果也反证了教育和职业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本土出生居民的增加，教育和职业的制约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此外，两组样本也都受到祖籍和社会网络的制约作用。



下面我们对两组样本中各制约因素的作用力进行比较，见表7。

	性别	教育程度	职业	祖籍	社会网络	语体
包头组	.144	.268	.139	.351	.166	.129
非包头组	.122	.143	-	.419	.373	.116

可以看出，性别、教育、职业和语体对包头组的制约作用都比非包头组有所加强。这4个因素是西方社会中制约语言变项的非常典型的自变量，可以大致说明包头昆区鼻韵尾变异的方向。与“阶层”变量直接相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因素对包头组的解释力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二者与社会网络的制约力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已经有了超越；与此相反的是，社会网络在包头组的作用力却比非包头组下降了许多，这一结果清楚地表明层化和网络结构在昆区的交替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层化模型可能越来越适合中国的言语社区结构，而社会网络的影响则可能相应减弱。

另一方面，祖籍对包头组的制约作用（.351/.419）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一显像时间（apprent time）的结果与1987年真实时间的结果恰好相互印证：1987年祖籍的变异范围为.526，而在本研究中则降至.358，说明随着新一代移民的成长，祖籍对鼻化的影响力将逐步减弱。

综上所述，对比整体样本和两个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包头组样本和整体样本的社会分布几乎完全一致：性别上，男性比女性有利于鼻化；教育上，大学程度最不利，而中学最有利；祖籍对包头组的制约力也低于非包头组。这样的结果基本可以证实我们前面的预设，昆都仑言语社区将逐渐本土化，形成自己的言语特色。

### 3.2 鼻尾脱落

同样地，两组样本在鼻尾脱落这一变项的社会分布也不尽相同，表8、表9列出了两组样本鼻尾脱落所受到的社会作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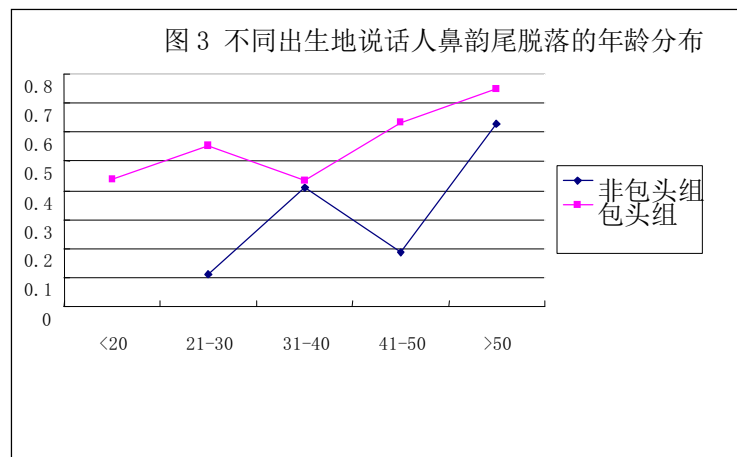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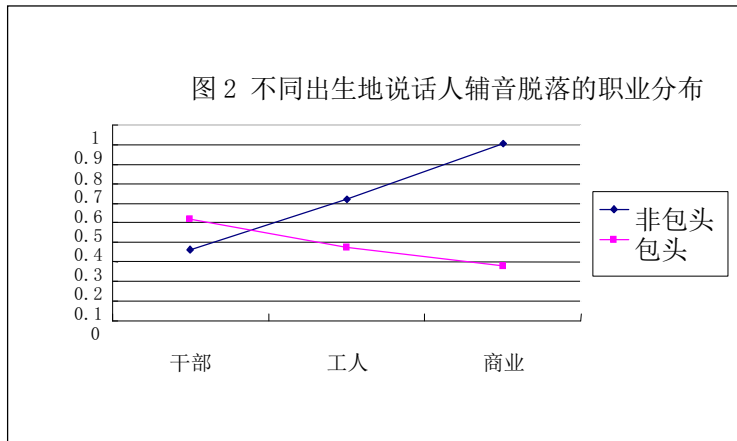
比较两组样本可见，祖籍和社会网络对两组样本都起作用，对包头组样本的制约作用稍强于非包头组。这与真实时间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987年的研究中祖籍和社会网络没有成为脱落的有效制约因素，而在本研究中，这两个因素都成为十分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同时，比较鼻化和脱落可知，祖籍虽然对二者都产生影响，但其发展趋势不同，显像时间和真实时间的结果都表明：它对鼻化的作用随着新一代移民的成长而逐渐减弱，对鼻尾脱落的制约作用则仍然较强。这说明，从祖籍上来看，虽然鼻化和脱落两个变项的来源同为第一代移民的家乡方言口音，但鼻化的本土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鼻尾脱落的本土化则较弱。

表 8 包头组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					
年龄			职业		语体
<20 .438	41-50 .631		学生 .588		会话 .552
21-30 .552	>50 .748		干部 .517		朗读 .369
31-40 .435	范围 .313		工人 .376		范围 .129
			商业 .280		
			范围 .308		
祖籍			社会网络		
陕西 .865	河北 .485	其它 .314	J .693	q .545	T .415
东北 .538	内蒙 .407	山东 .163	Y .585	G .554	B .410
		范围 .702	A .572	Q .468	L .154
					范围 .539

表 9 非包头组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50 .627	41-50 .187		大学 .643		干部 .361
31-40 .411	21-30 .112		中学 .445		工人 .620
	范围 .515		小学 .414		商业 .903
			范围 .229		范围 .542
祖籍			社会网络		
内蒙 .717	陕西 .529	山东 .328	J .775	A .527	L .436
其它 .641	河北 .525	东北 .231	B .662	T .484	Y .353
		范围 .486	G .661	Q .477	q .307
					范围 .468

年龄和职业都是两组样本的有效制约因素，但分布趋势不同（图2、图3）。职业分布上，非包头组呈现出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上扬的态势，包头组则正好相反，出现了与整体样本相似的超越模式，商业工作者和工人都不利于脱落，干部却成为脱落的促进因素。

在年龄上，两组样本的鼻尾脱落都基本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减轻而递减的趋势，与整体样本的结果一致：年纪越轻，鼻尾脱落越少。但包头组的发展态势波动较小，说明鼻尾脱落在新移民中的分布更趋于有序状态；另外从图中也不难见出，两组样本中31-40岁年龄段的作用值几乎重合在一个点上，显然，该年龄段的说话人不管是包头出生的还是非包头出生的，其对鼻尾脱落的影响力都较为稳固；而小于30岁和大于40岁的说话人却都因出生地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进一步比较两组样本和整体样本可以发现：包头组鼻尾脱落的发展趋势比非包头组更接近整体样本。仔细分析：年龄上，两组样本的鼻尾脱落都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减轻而递减的趋势，与整体样本的结果一致：年纪越轻，鼻尾脱落越少。职业分布上，包头组出现了与整体样本相似的超越模式，商业工作者和工人都利于脱落，干部成为脱落的促进因素，非包头组则正好相反，呈现出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上扬的态势。语体上，包头组和整体样本一致，会话体有利于脱落，朗读体不利，鼻尾脱落成为“标记项”，非包头组没有出现语体差异，脱落只是一个“指示项”。教育程度上，包头组尚未发现差异，非包头组则出现了与整体样本相反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脱落越多。

表 10 列出了包头组、非包头组两组样本各制约因素的作用力比较。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祖籍	社会网络	语体
包头组	.313	-	.308	.702	.539	.129
非包头组	.515	.229	.542	.486	.468	-

表中数据显示，包头组和非包头组的鼻韵尾变异情况所受到的社会制约确实有较大的不同，除了祖籍的作用以外，包头组鼻尾脱落的发展趋势在年龄、职业、语体的分布上都比非包头组更接近整体样。可以推测，虽然目前昆区鼻尾脱落的本土化进程较缓，但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随着包头出生的人越来越多，很可能会继续推动其本土化发展。

此外，结合鼻化可以看出，职业和社会网络这两个因素对鼻韵尾变异的制约作用似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表6到表5，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显著降低，变异范围从.373降至.166，

职业因素的作用力却大大提升，从没有被选中为有效因素提升到作用力和社会网络基本相当；而从表9到表8，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提高了（.468→.539），职业的作用力却有所降低（.542→.308）。这说明，层化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式虽然可以同时用来对某个言语社区进行变异分析，但二者终究具有一定的不相容性，往往出现此消彼长的规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社会分层的垂直结构较为明显的话，那么它扁平状的网络结构必然会趋向于松散。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其一，鼻韵尾的两个变项都有了新的发展：鼻化，从指示项发展为标记项；脱落仍然是标记项，但变化趋势明显减缓；二者都显示出不同的群体特征，并表现出语体特征，整个言语社区的语体转移方向是一致的。相比于1987年，昆区北方话的鼻韵尾变异已经和多种社会因素产生了相关关系，处于更加有序的状态。其二，比较两个分组样本的结果可以清楚看出，鼻韵尾变异在两组样本中的社会分布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就好像特鲁吉尔诺里奇市语音变异中的拔河比赛<sup>[12]82</sup>，不过参赛的选手不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换成了包头出生和非包头出生的人。与整体样本结果相比可知，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初见分晓：包头本地出生的人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将引导着变异的发展方向。其三，比较两组样本的结果并结合整体样本和1987年的调查来看，在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两个变项中，整体样本的发展趋势都与包头组样本更趋于一致，说明昆区的鼻韵尾变异整体上是朝着包头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元音鼻化的本土化倾向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基本可以回答引言中提出的问题：在包头昆都仑区，移民的方言背景已不再是该言语社区最强的影响因素，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昆都仑区的语言特征正逐渐朝本土化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

- [1]梁德曼. 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方言, 1985 (4).
- [2]郭友鹏. 湖北十堰市普通话与方言的使用情况.中国语文, 1990 (6).
- [3]杨晋毅, 孙永庆, 潘桂英. 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言文字应用, 1997 (4).
- [4]杨晋毅. 试论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 1999 (1).
- [5]杨晋毅. 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4 (1).
- [6]杨晋毅. 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文研究, 1997 (1).
- [7]徐大明. 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研究, 选自 董艳萍、王初明编.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与应用——庆祝桂诗春教授七十华诞,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8]徐大明. 新加坡华社双语调查——变项规则分析法在宏观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当代语言学, 1999, 1(3).
- [9]吴翠芹. 包头鼻韵尾变异: 言语社区的定量分析.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10]Xu Daming. A Sociolinguistics Study of Mandarin Nasal Variation. University of Ottawa Dissertation. 1992
- [11]徐大明, 陶红印, 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2]简·爱切生. 语言的变化: 进步还是退步? .徐家祯译,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 [13]徐通锵.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中国语文, 1989 (2).
- [14]徐大明. 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15]彭清深, 张祖煦. 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之纵向考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4).